

## 经济增长视野下的工业化和对外贸易

于春海

199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服务于工业化进程的调整和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断演变，从满足国内生产的投入需求和产出实现这两个角度，外贸成为突破工业化进程国内约束的有效手段。工业化和对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我国工业化结构和贸易结构动态调整的背后，比较优势基础并没有实现动态化。从国际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我国主要的优势产业；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扩张并没有带动国内工业附加值的增加。这就说明我国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依然是基于静态的劳动成本优势之上。这种简单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在带动我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大。这集中表现为近年来所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环境和资源压力加大、比较优势基础固化和静态化。

过高的经济增长成本威胁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调整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方向，工业的发展注重利用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成果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简单地用重化工业替代传统工业的“重化工业化”。在整个产业结构中，要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核心的非贸易品行业。适应工业化道路的调整，外贸战略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在进口战略方面，应服务于改造国内传统产业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需要，实现工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三者之间的互动调整，克服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与比较优势静态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工业结构升级构建长期可持续的基础。在出口战略方面，摆脱那种简单地适应国内现有加工业粗放扩张的模式，减少一般制成品出口的政策性优惠，实现一般制造业的有序调整和收缩；利用出口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引导国内工业部门的调整。适应于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服务业的需求，综合利用收入分配政策、汇率政策、出口政策和进口政策等，改变国内居民的需求结构，突破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需求约束和投入约束。

## 一、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全方位开放战略之下得以迅速推进。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随着开放的全面深入而加速发展，1992 年至 2004 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38.6% 增至 45.9%。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扩张。1991 年以来，工业对 GDP 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 50% 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工业的增长。1992 年至 2004 年，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 9.8%，其中有 5.8 个百分点是来自工业的增长。

图 1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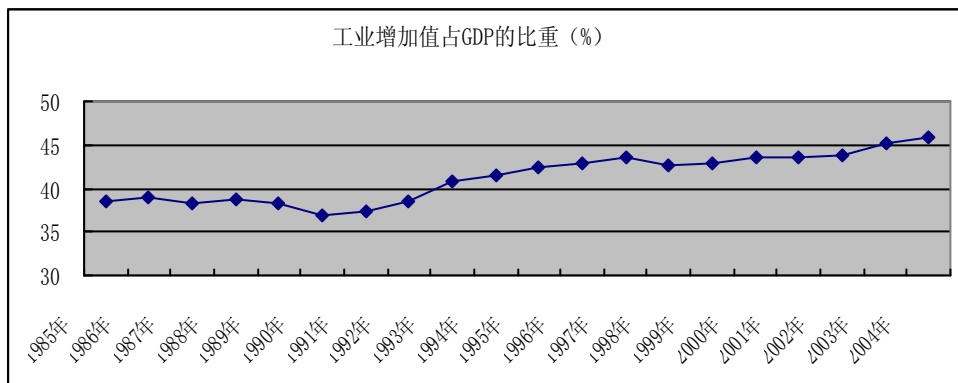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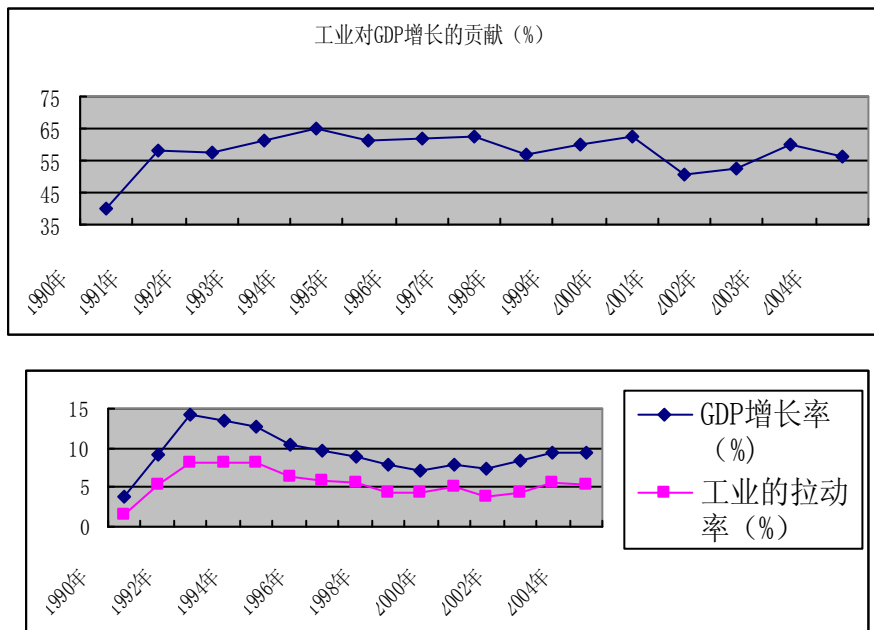


图 2 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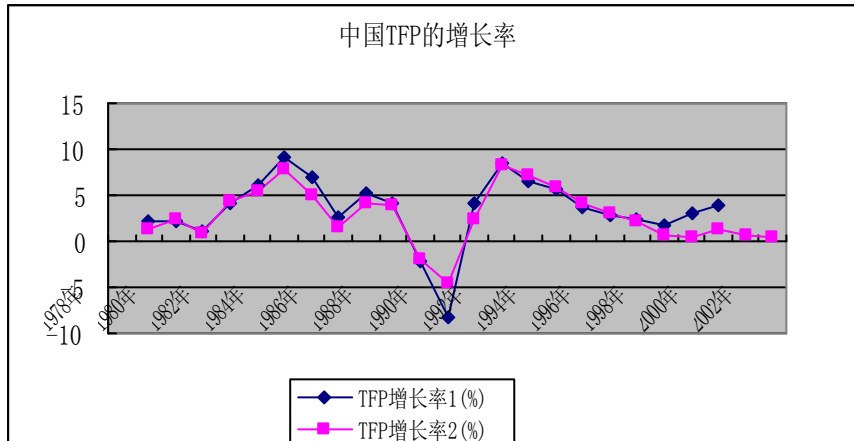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人均资本存量 ( $K/L$ ) 的提高，二是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提高。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

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下式（于春海，2006）：

$$\ln(Y/L) = \ln(TFP) + 0.51 \ln(K/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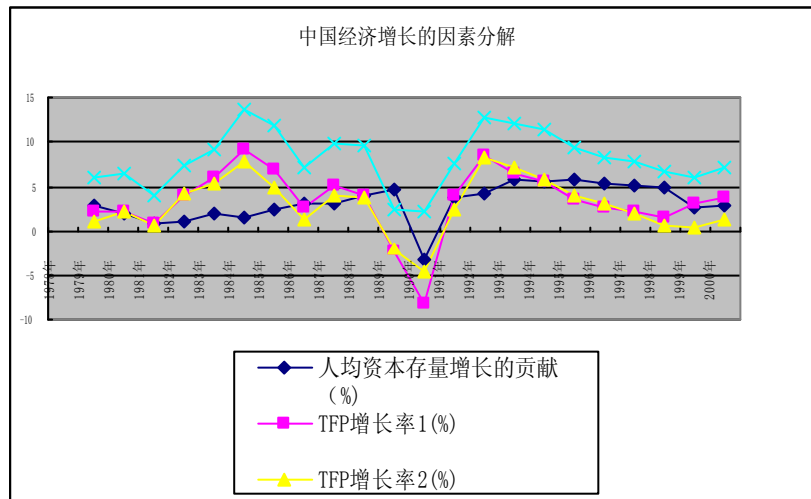
由此可以得到中国 TFP 增长率的估算数据<sup>1</sup>：

图 3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进一步结合人均 GDP 的增长率数据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数据<sup>2</sup>，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解<sup>3</sup>：

图 4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由此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存量和 TFP 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相对作用是变化的。在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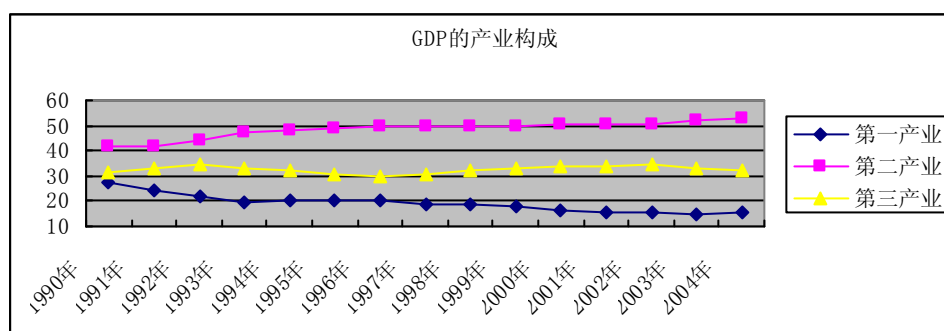
<sup>1</sup> 关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因素涉及到生产函数的选择以及资本存量数据的估算，所以最终估算数存在很大差异。我在这里给出两种数据，TFP 增长率 1 是于春海（2006）的估算数据，TFP 增长率 2 是王英伟和成邦文（2006）的估算数据。两个数据的变动趋势基本吻合。

<sup>2</sup> 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刘元春（2004），人均 GDP 和就业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sup>3</sup> 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是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 0.51 乘以人均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 1994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则更多的是来自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这也是目前很多人所说的“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但无论是哪种因素的变化，主要动力之一都是工业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替代，即所谓“二元经济”转型。而服务业比重的变动相对较小。在工业替代农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工业相对农业是资本密集的，GDP 构成中工业比重的增加必然导致全社会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正是通过这两个基本途径，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施加了显著的推动力。

图 5 中国 GDP 的产业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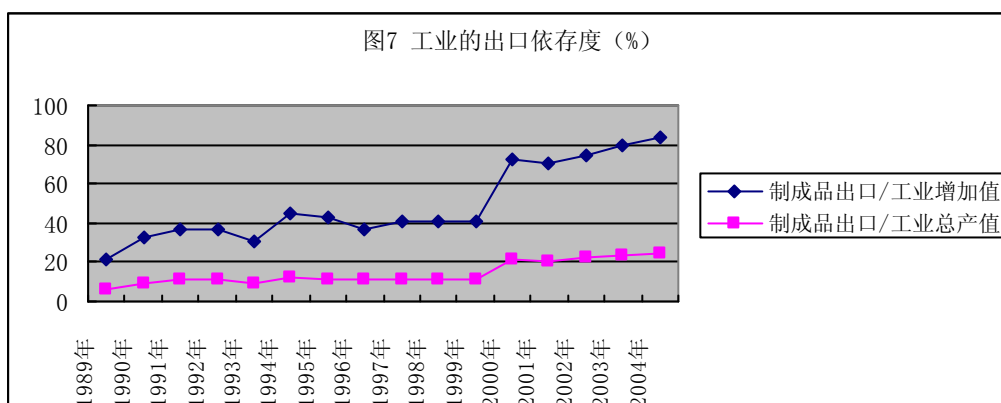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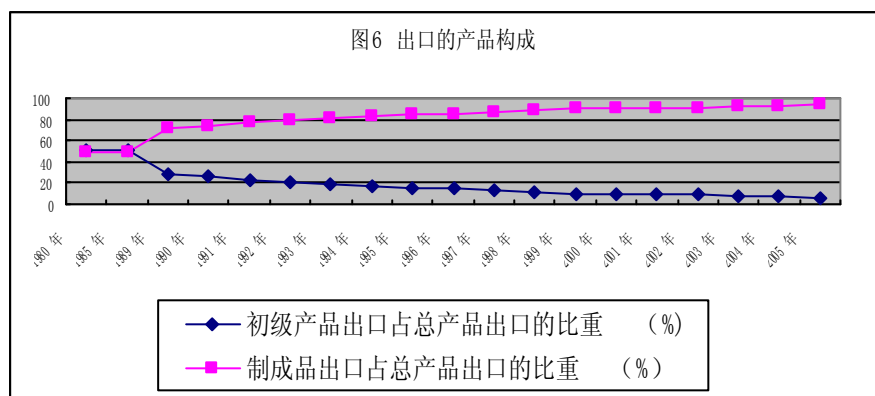
## 二、对外贸易是突破国内工业化约束的有效手段

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外开放来突破工业化的约束。对外贸易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它配合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或者说，工业化是对外贸易撬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杠杆。由此，可以界定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内涵就是：利用开放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的趋势，基于劳动成本优势构建我国开放背景下的工业化模式。基于劳动成本优势这一共同的基础，构建相互关联的外贸战略和工业化模式，这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使制造业出口得到高速发展，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制造业的转移趋势使得中国的工业在出口带动下迅速发展。

### ● 制成品出口拉动下的工业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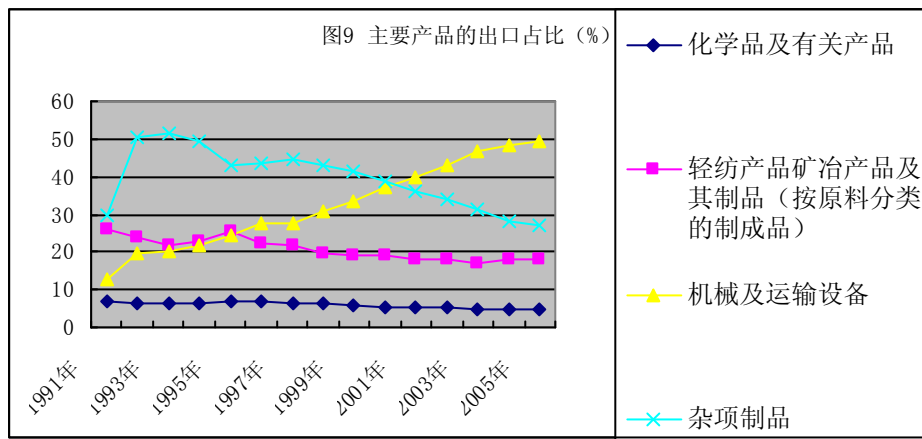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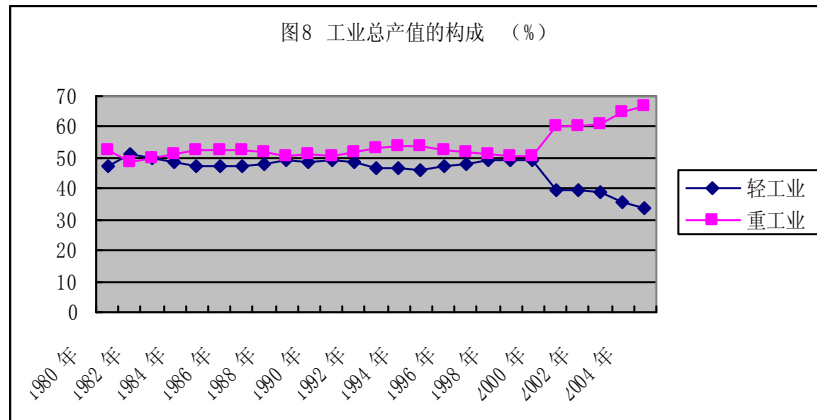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 GDP 的产业构成中，工业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37% 升至 2004 年的 45.9%（见图 5）。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出口中，制成品出口在总出

口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74.4% 升至 2005 年的 93.6% (见图 6)。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工业的出口依存度, 可以看出, 1990 年以来制成品出口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了 50 个百分点。这在总量上反映出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对于出口的高度依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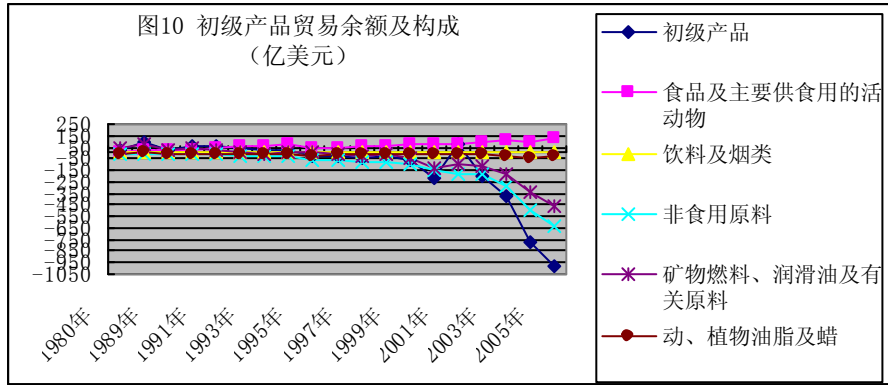


● **重化工业阶段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依赖于对外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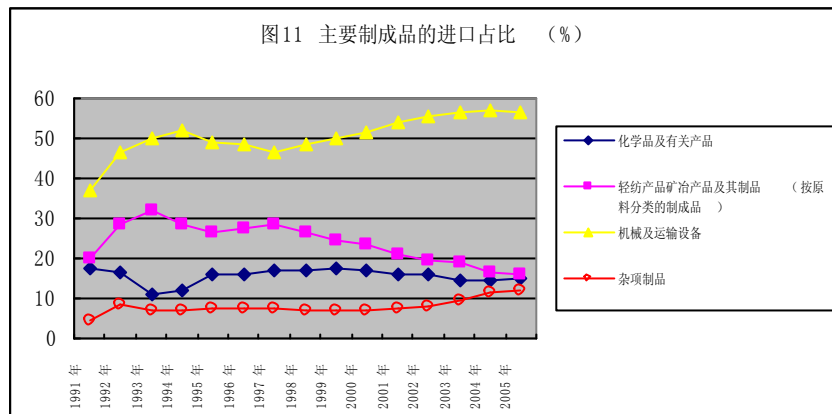
2000 年以后, 在我国的工业结构中, 能源、钢铁、机械、化工、汽车和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比重迅速提高。从 1999 年到 2005 年,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50.8% 升至 66.5% (见图 8)。这反映出我国工业化进程逐步从轻工业化阶段走向重化工业阶段。对此相对应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超过杂项产品, 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见图 9)



重化工业对轻工业化的替代是我国近年来工业化过程继续向前推进的基本特征。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表明，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基础发生了变化。出口的增长从市场实现的角度拉动了重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但是从投入角度来看，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依赖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投入，其次还依赖于机器设备的大量投入。而在这两个方面我国都没有优势，也就是说，重化工业的发展在国内面临投入约束。相关产品进口的增加，有助于我国突破发展重化工业面临的投入约束。2000年以来，在初级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在非食用原料和矿物原料等产品上逆差不断增加，（见图 10）这反映出国内重化工业发展对于进口原料和资源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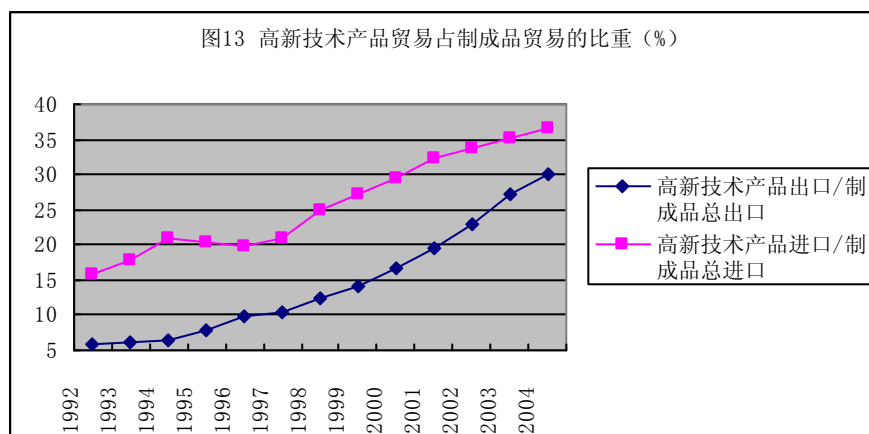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在制成品进口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比重显著提高，从 1997 年的 46.4% 增至 2005 年的 56.7%。（见图 11）这反映出我国重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在投入方面依赖于进口的机械和相关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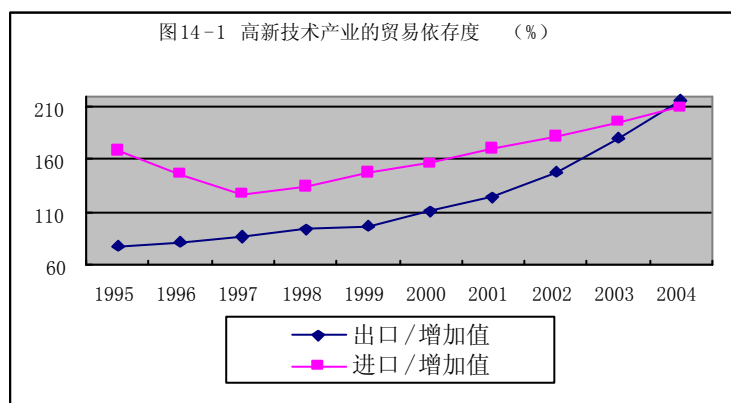
● “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凸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过度外向性

顺应国际分工体系变化和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推进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层次的另一个选择。90 年代中期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95 年至 2004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4.4% 增至 11.6%，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4.5% 增至 14.8%（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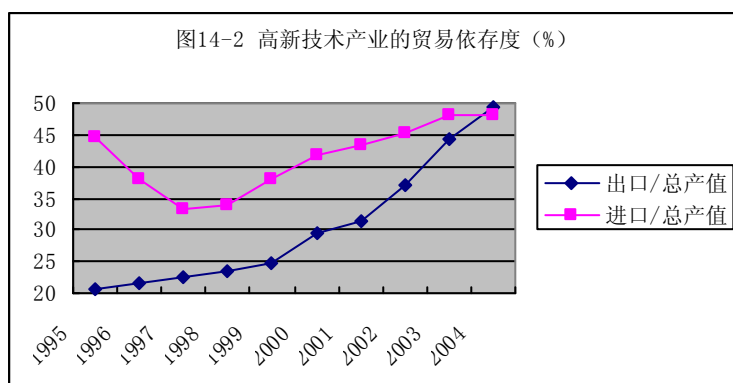
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在制成品出口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从1995年7.9%上升至2004年的29.9%。在制成品进口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占比从1995年20.3%上升至2004年的36.6%。（见图13）



在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该产业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1995年至2004年，出口占增加值的比重从80%增至215.8%，远高于同期制造业整体的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甚至更高，一直在100%以上（见图14）。根据总产值来衡量，出口依存度从1995年的20.6%升至2004年的49.3%。进口和出口依存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建立到发展和扩张的过程。1990年代中期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处于建立初期，其产出能力较低，必须大规模的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以满足国内的需求。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产出规模不断增加，产出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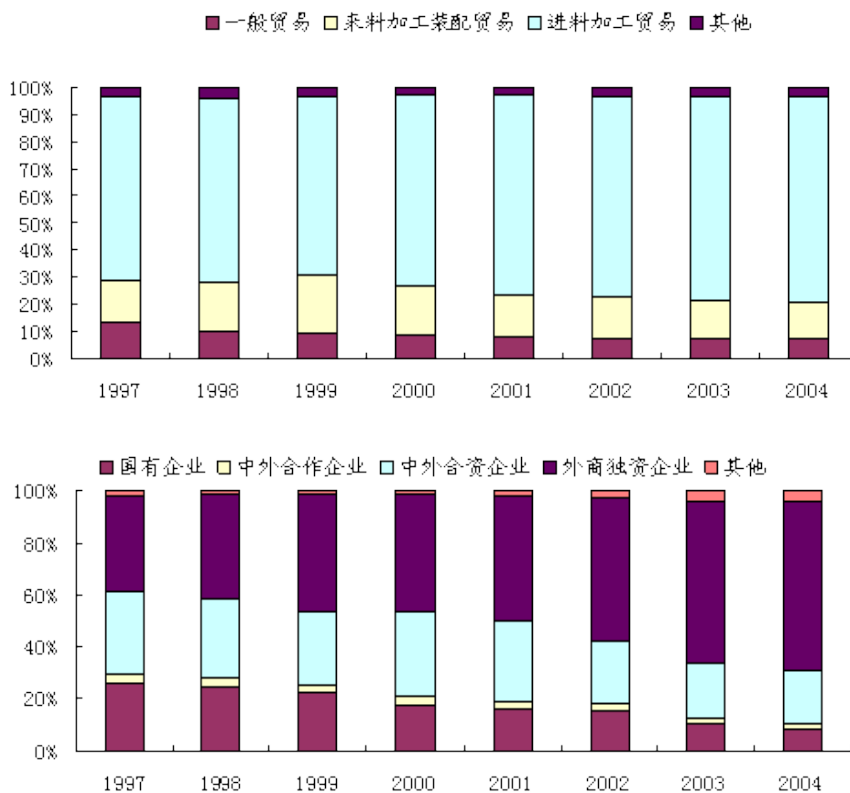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极高的进口和出口依存度，这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和出口企业的类型，可以发现，进料加工贸易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主要贸易方式，比重达到 70%左右；在出口的主体结构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通过进口相关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经过国内简单加工，然后以制成品的形式出口国际市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外向性，对外贸易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高于其他制造业。

图 15 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和出口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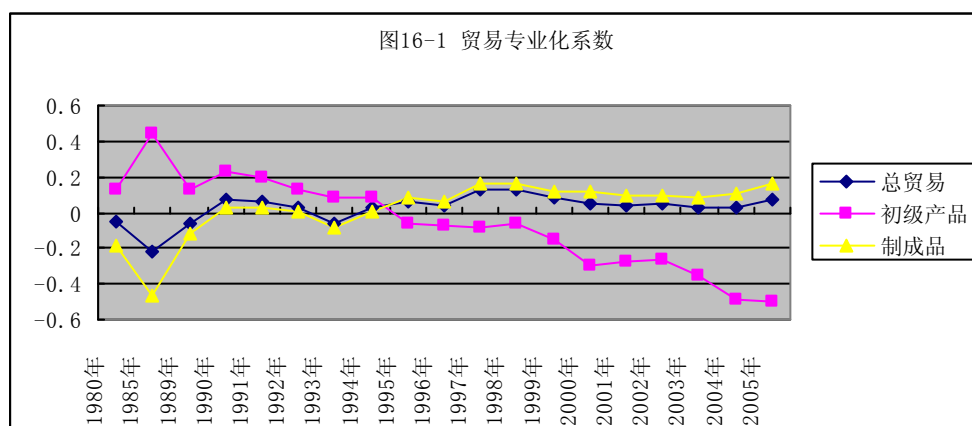


### 三、劳动成本优势是决定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比较优势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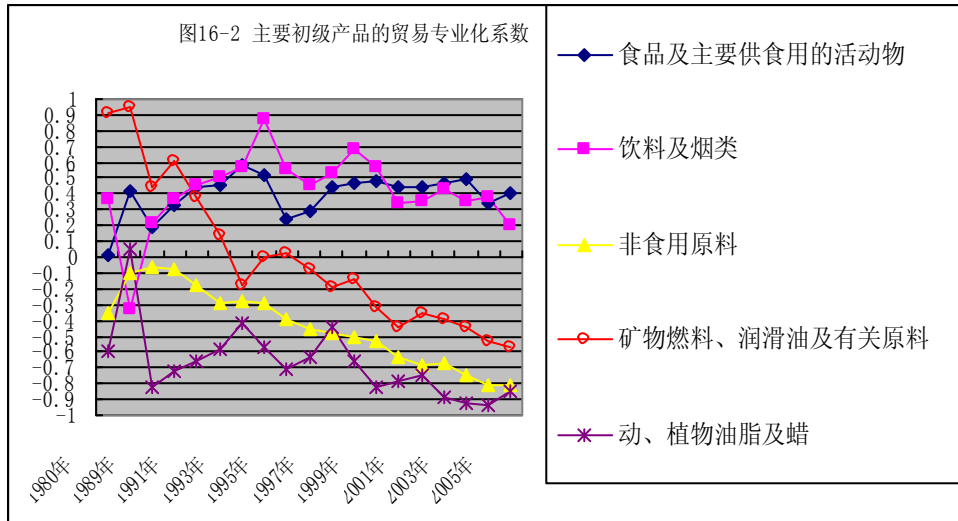
工业化与对外贸易之间互动关系，反映了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内涵，即利用进口和出口突破国内工业化过程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受到的约束。在外向型战略之下，我国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实现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但是在这种变化背后，决定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定位的比较优势基础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的工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了动态变化和升级，但是其背后的基础即比较优势，并没有实现动态变化。

#### ● 贸易结构的动态调整反映我国劳动成本优势的实现形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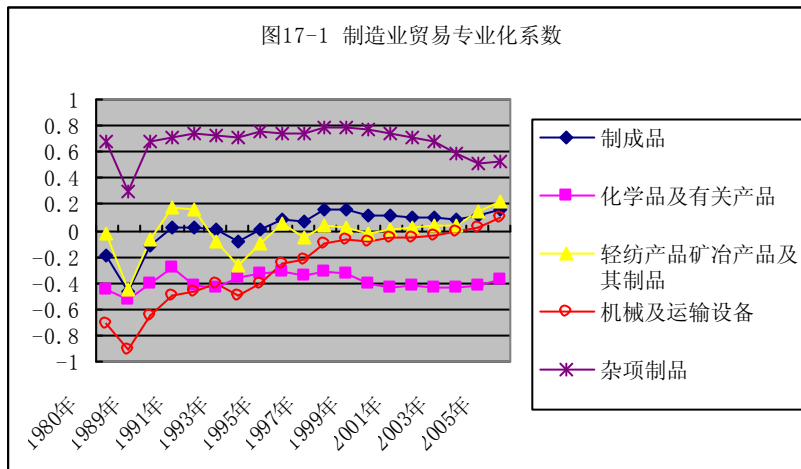
首先考察在我国不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这用贸易专业化系数<sup>4</sup>来表示。我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在 1997 年至 2004 年之间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后周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的不利影响。而初级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在 1994 年以后一直是负值，并且不断下降。（见图 16-1）在初级产品贸易方面，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基本都是负值，并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能源或资源性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是我国初级产品整体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见图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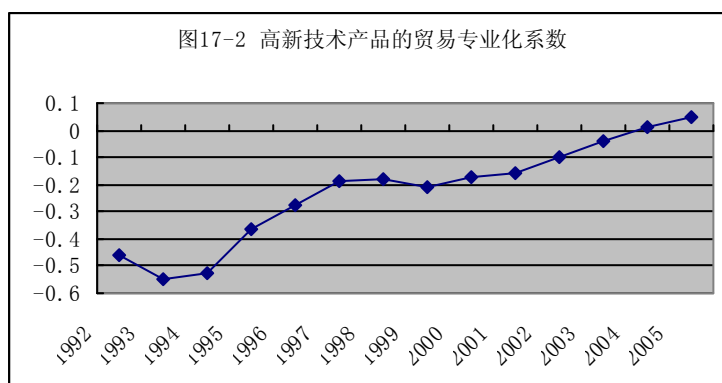
<sup>4</sup> 净出口/贸易总额。



在制成品贸易上，制成品整体贸易专业化系数在 1997 年以后的变化不大。但是在制成品内部，杂项产品专业化系数的下降趋势、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up>5</sup>贸易专业化系数的上升趋势都非常明显（见图 17）。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化，重化工业对轻工业的替代，导致以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顺差相对下降，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以及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相对上升。



<sup>5</sup> 轻纺产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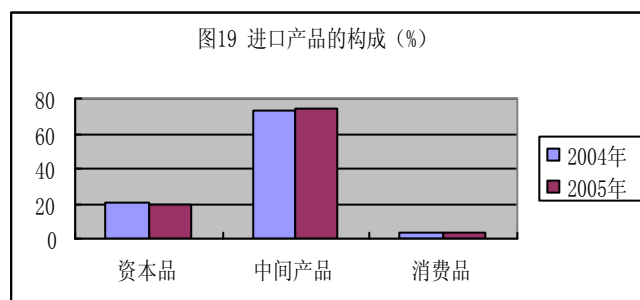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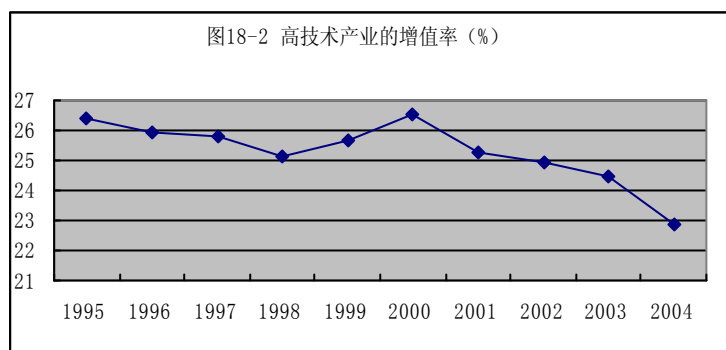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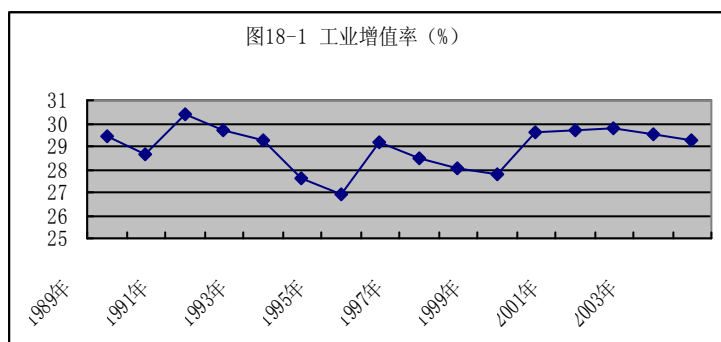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我国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只有0.049，轻纺产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为0.23，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贸易专业化系数为0.1，杂项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为0.52。杂项产品直接体现了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在杂项产品以外，我国制成品中竞争优势最大的就是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由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主要是资源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品或者是资源和资本密集的矿冶产品及其制品，考虑到我国在初级产品上的贸易逆差和竞争劣势，这类产品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方式体现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即进口矿物原料等，经过简单的劳动加工后再出口。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贸易专业化系数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反映出我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的改善和提高。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在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上具有显著的加工贸易特征，通过进口零部件和中间投入，经过简单的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这当中体现的比较优势基础依然是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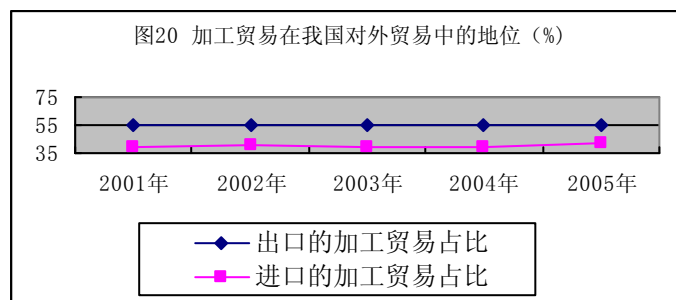
### ● 缺乏动态比较优势阻碍了我国工业生产附加值的提高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动态调整的同时，由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仍然建立在劳动成本优势之上，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并没有实现动态化，所以，国内工业生产的附加值并没有显著提高。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增值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无论是重化工业对轻工业的替代，还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没有显著改变我国的工业增值率。2000年以后，在我国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制造业的总体增值率反而在下降（见图18-1）。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增值率在2000年以后出现甚至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18-2）。这也就说明，我国重化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摆脱投入驱动的模式，而投入方面又必须依赖于进口才能突破国内约束。在我国进口产品中，中间投入占据绝大比

重。2004年和2005年，中间产品占我国产品进口的比重分别是72.9%和74.7%（见图19）。在国内增值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或组装环节的情况下，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推动作为投入的进口品的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推动作为产出的出口品的价格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得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在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升的同时，出现下降的趋势。工业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从一个侧面说明劳动成本优势依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基础。



通过分析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可以进一步证实劳动成本优势依然是决定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比较优势基础。2000年以来，我国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维持在55%左右；在产品进口中，加工贸易占比在38~42%之间。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演变过程始终是围绕着劳动成本优势展开的。这是不变的基础。变化的只是，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中国发挥和体现劳动成本优势的形式、产业载体和产品载体在不断变化。顺应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国际产业调整过程中的新机遇，中国通过调整工业化模式和对外贸易模式，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变化，由此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外贸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这样的观点是有偏差的。中国工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变化更多的是反映比较优势的实现手段和产业载体的变化。

2004年以前，以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杂项产品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即劳动成本优势。但是对比2000年前后的情况，在2000年以前，杂项产品还是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2000年以后，机械和运输设备成为我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变化趋势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出现，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逐渐赶上杂项产品的出口。这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模式的变化，也是我国利用劳动成本这一优势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发生了变化。90年代中期以前，以一种较为直接的或显性的模式利用劳动成本优势，即直接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工业化过程也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90年代中期以后，实现劳动成本优势的形式发生变化。除了借助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我国的比较优势，还借助于机电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这些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所以，在我国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动态调整的背后，比较优势并没有实现动态调整。

#### 四、基于劳动成本优势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问题及调整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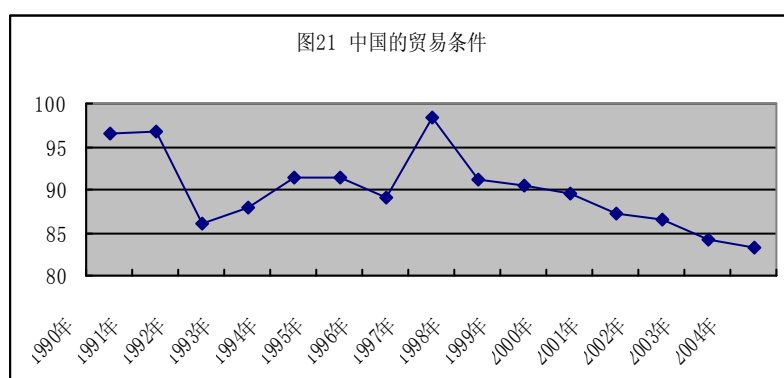
##### (一)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模式导致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加

近年来，贸易条件、资源消耗状况、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已经显露出中国现有工业化模式和外贸战略的成本不断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现有基于劳动成本优势的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不断增加。

### ● 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明显

近年来，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化工业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同时，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外向性更加明显，重化工业在投入和市场两个方面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整体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基于制造业的 FDI 经济”，在这当中，加工贸易型的 FDI 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模式之下，经济增长和产业扩张首先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大幅增加，由此导致进口价格和成本上升；其次是出口供给急剧扩张，导致主要出口品的国际价格大幅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收益下降，社会福利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步伐。

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整体的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在我国工业化过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严重依赖于进口来满足投入需求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加。这也是导致我国工业增值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 ● 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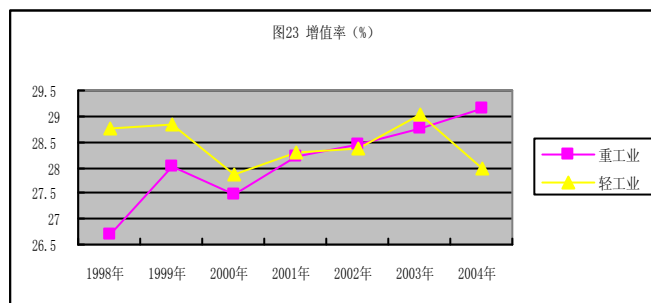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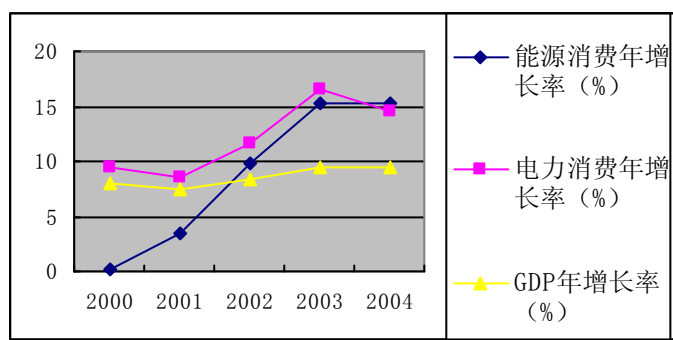
在总体上，我国是一个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主要矿产资源、原材料、能源、水资源、土地等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发展重化工业必然意味着进口需求的迅速增加，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

在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条件下，以大规模出口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的重化工业陷入高消耗、高产出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GDP



增长 10 倍左右，但是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 40 倍左右。主要产品生产的能耗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1 年以后能源消耗的年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率。2003 年我国实际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为 4%，但是原油消费占世界的 7.4%，原煤消费占世界的 31%，铁矿石消费占世界的 30%，钢材消费占世界的 25%，水泥消费占世界的 40%。每单位 GDP 产生的二氧化碳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300%左右，废水排放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400%。重化工业的发展，在带动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同时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增加值。重化工业并没有表现出比轻工业更高的增值率（见图 23），因此对后者的替代也不能显著提高我国工业的增值率。

图 22 能源和电力消耗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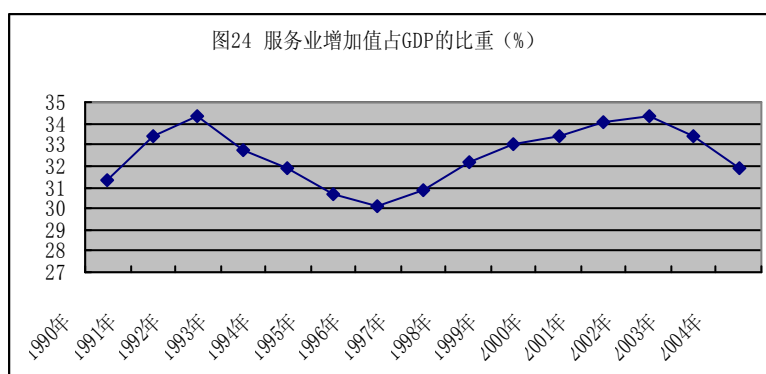


### ● 贸易品部门过度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滞后，长期就业压力加大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模式导致贸易品行业的过度发展和整体产业结构的扭曲。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下，资源流向贸易品工业，社会生产结构向贸易品工业倾斜。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特定的外汇管理制度，导致整个社会的信贷分配格局向贸易品部门倾斜，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得不到足够的信贷和政策支持。其结果就是，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在我国 GDP 中的比重不到 35%，远低于世界平均的 64%。2002 年以后，在我国重化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的比重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服务业作为正外部性极强的产业，其发展不仅有利于就业创造，还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服务业的



发展滞后不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和长期经济增长。



重化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投入和产出规模的扩张并不能带来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加之我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基本是一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国内主要从事的是加工环节，增值规模远远低于总体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就业创造。与此不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其发展不仅具有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而且对于其他部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无论是重化工业还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贸易品部门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和整体产业结构扭曲，不利于我国就业压力的缓解和整体的长期增长。

### ● 比较优势固化的风险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下，我国面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我国进口成本的加大，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进口成本增加会损害出口竞争力和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企业削减包括研发投入在内的各项开支。此外，为了维持贸易品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倾向于使用出口退税、出口补贴、低工资、低利率等措施。这不仅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限制了国家在研发和基础科研方面的投入能力，而且会使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利润下降趋势使得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下降；财政补贴和退税使得财政收支恶化，抑制政府资助研发和科研的能力；低工资成本也会抑制企业使用现金设备和研发创新的意愿。这不利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和升级，甚至会使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导致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固化，阻碍了国内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二) 政策建议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加。为此必须摆脱传统

的工业化模式，转向强调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配合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 ● **摆脱“轻工业→重化工业”这一简单的产业升级模式**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从轻工业逐步过渡到重化工业阶段，似乎都是产业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基本模式。但是从中国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模式既非必要、也不可行。在开放条件下，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依赖于国内的比较优势基础，工业化模式变迁的实际效果也取决于比较优势基础。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就业压力较大、资源匮乏、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供给能力不足，重化工业加工规模的扩张并不能带动产业链条在国内向两头延伸。在这种状况下，我国的产业升级就不应该选择“重化工业替代轻工业”这样的简单模式。在目前重化工业化趋势日渐明显的背景下，要打破“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发展重化工业→能源和原材料进一步短缺”这样的恶性循环，必须从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和引导，抑制各地盲目发展重化工业的趋势，切实、有效地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升级在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利用新技术和信息产品改造传统产业；逐步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工业部门。

### ● **逐步改变外贸战略的出口导向性，从“重视出口”转向“重视进口”**

贸易战略调整的基本原则是服务于工业化战略调整的需求，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条件。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还是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建立，都面临投入约束，必须通过进口来满足。所以，必须调整进口战略，鼓励和引导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相关机器设备的进口。这牵涉传统贸易政策领域中的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调整，还涉及汇率政策、国内立法和市场秩序等问题。通过贸易政策调整，降低进口过程中的政策成本或贸易成本；合理使用汇率政策，适度的升值有助于压低相关产品和技术的进口成本，从而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完善国内法律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相关机器设备的进口营造一个稳定、低交易成本的大环境。这方面的调整更多的是关注于如何突破建立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时面临的国内约束。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压缩和降低一般制造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主导产业从传统产业转向新产业。在新、旧产业交替的过程中，

国内会出现短暂的“主导产业缺位”的问题。这会增加国内就业压力、财政压力和其他社会压力。这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新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改造。贸易政策的调整应该兼顾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避免一般制造业或加工工业的急剧收缩。应该减少对一般制成品出口和加工贸易型 FDI 的优惠政策，让市场竞争压力引导投资者和企业的主动调整，避免出现政策激励与政策目标不相容的问题。出口方面的政策重点引导一般制成品的出口规模有序的降低，避免出现威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甚至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急剧收缩。

- **加快调整外贸企业的工资形成机制，使工资水平和各种社会福利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这既可以激励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避免贸易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来获取竞争优势，增强贸易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减少直至取消对贸易企业的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让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回归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这一基础。在较少直接出口补贴的同时，增加对研发和基础科研的财政投入。通过这些调整，加快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才数量优势；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转让和扩散体系的构建。最终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不断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始终依赖于劳动成本优势的格局。

- **通过贸易政策和引资政策的调整，充分发挥外资和外贸对国内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进口产品特别是资本品进口的来源和 FDI 来源越来越集中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进口产品和 FDI 的技术含量。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提升进口和 FDI 的技术含量。首先是完善国内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内对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和 FDI 的吸收能力。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和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进口产品和 FDI 的技术含量。其次是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为提高进口产品和 FDI 的技术创造有利的国际市场和政策环境。